

Collection of
Life Philosophy
Research

生命哲学
研究丛书

高宣扬 / 主编

从自然之善到公民幸福 ——卢梭的人文主义

常雪敏◎著

From Natural Goodness to Civic Happiness:
Rousseau's Humanism

人民出版社

生命哲学

研究丛书

高宣扬 / 主编

从自然之善到公民幸福

——卢梭的人文主义

常雪敏◎著

From Natural Goodness to Civic Happiness:
Rousseau's Humanism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自然之善到公民幸福:卢梭的人文主义/常雪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3

(生命哲学研究丛书/高宣扬主编)

ISBN 978-7-01-018943-7

I. ①从… II. ①常…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
人道主义-思想评论 IV. ①B565.26 ②B82-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1656 号

从自然之善到公民幸福

CONG ZIRAN ZHI SHAN DAO GONGMIN XINGFU

——卢梭的人文主义

常雪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75

字数:210 千字

ISBN 978-7-01-018943-7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生命哲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批准号：14ZDB018）最终研究成果。

- 高宣扬 《生命的自我创造精神》，待出
- 杜保瑞 《中国生命哲学真理观》，已出
- 常雪敏 《从自然之善到公民幸福——卢梭的人文主义》，已出
- 尚 杰 《觉醒》，待出
- 赖贤宗 《儒家生生之仁与康德实践哲学当代诠释》，待出
- 赖贤宗 《老庄生命哲学与海德格尔》，待出
- 雷 静 《识仁与担责——阳明学的生命哲学视野》，待出
- 邓 刚 《身心与绵延——柏格森论身体、精神及其关系》，待出
- 刘 妮 《先秦儒家的情感问题》，待出
- 蒋 阳 《尼采生命哲学》，待出

.....

总序

高宣扬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了解和珍惜自己的生命。正如中世纪神学家和思想家奥古斯丁所说,每个人都在时间中度过,但一旦问起“什么是时间”,人们却茫然失措,无以言答。当现代化越来越紧迫的进程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紧张的生活节奏的时候,许多人只顾埋头工作,一心专注于眼前的事务,把完成议事日程上的具体活动当作主要的生活内容,使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近乎盲目的简单重复性运动中,而把至关重要的自身生命问题置之度外,也逐渐忘却了现代化本身的创新使命及其与自身生命的内在联系。

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物理实验室的工作中,而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关注生命”和“热衷于创新”交融在一起,构成他生命的原动力,使他在1944年发表《什么是生命》,试图以热力学、量子力学和生物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性与价值,强调生命靠“负熵”(Negentropie)来保障其自身有序的系统组织性,使生命有可能持续地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薛定谔说得对:“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而是针对所有人都看见的东西做一些从未有过的思考”,一语道破现代化的创新精神,也喊出了生命本身发自其内在本质的强有力创新呼声。

其实,早在现代化的黎明时期,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兼诗人维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就明确指出: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创新;有了生命,光是活着,或仅仅空想,不实行创新活动,就辜负

了生命的价值。他说:“真理本身是做出来的”(verum esse ipsum factum; the true itself is made);要使生命的存在价值发挥出来,就必须创造性地“做”,有所作为。维科反对笛卡尔过于倚重“我思”,反对使生命的创造行动纳入格式化的理性逻辑中。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形而上学地反思理性所想到的一切,而是分析出导致创新行动的思想原因。1725年维科发表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更明确地论证现代化时期新科学的基本精神:珍惜生命本身的创造性力量,发扬古人的诗性智慧,充分发挥想象的威力,不断开辟新视野,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新作品。

生命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创造活动。最早的时候,希腊人用 Autopoiesis 这个词表示“自我创造”:Auto 就是自身,poiesis 表示“创造”或者“生产”。很发人深思的是,希腊人用同一个词根表示“生产”和“诗歌”,把创造、生产和诗歌当成是一回事。在天真的古希腊人看来,生产和创造的共同特点,就是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都是开创性和实验性的探险活动,它们是人类所固有的自由的思想创造活动,因此,唯有诗歌、诗人,才有资格被当成是人类这种固有的创造精神的典范。

但人类只是经历千百年来长期艰苦的科学探索以及实际体验之后,才对生命自身的自我创造性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直到1972年,“自我创造”(Autopoiesis)这个词才由智利的生命科学家洪贝尔多·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 1928—)和弗朗西斯科·瓦列拉(Francisco Varela, 1946—2001),正式首次引入当代生命科学中。从那以后,“自我创造”成为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集中凸显生命本身的基本特征,并由此突破了原来生命科学的狭小范围,成为推动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典范式的概念。

从此以后,在自然科学中,首先是直接研究生命的各个学科,诸如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生物分子、生物物理、纳米科学、基因工程、胚胎学等;其次是所有与生命的生存及其条件紧密相关的学科和现代技术,包括环境科学、伦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向生命哲学研究提出越来越紧迫的挑战。

正如牛津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成立宣言所说:“生命科学是一门令人激

动并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它涉及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也采用了越来越复杂的方法,因而,生命科学本身正在演化和分化成越来越多的分支科学,包括‘维持生命的生命科学’、‘分子基因学’等”。生命科学不仅在自身越来越复杂的各个分支中,开创性地使用越来越深入细致的严谨细腻的新方法,而且,也越来越高速地膨胀到更多的领域,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学科,开辟越来越多的前沿学科,富有挑战性地把生命研究同自然科学中生物学之外的各个学科连接在一起,使生命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最有领导地位的“牵动性学科”,不只是带动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物理学、基因工程等朝向微观世界的精密科学,同时也带动天体物理、宇宙生成学、宇航生物学、太阳粒子研究等朝向宏观世界的新型学科,而且,也把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使人类的创新活动导向史无前例的新方向。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国外环绕生命哲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和内容,就其原始资料而言,远的不说,在近30年间,包括各种论文、专著及文献等,已达成千上万,毫不夸大地说,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数量之多,论题之复杂,涉及面之广,多学科之穿插性,新概念和新方法之多样化,都是史无前例的。研究状况之热烈气氛及其丰富性,一方面表示这一研究课题的广泛性、传统性、延续性、多样性及其含糊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也显示生命哲学探索的迫切性、前沿性及其重大意义。

国内学术界对于生命科学和生命哲学的研究和探索,自改革开放之后,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近40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一代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当代生命科学的划时代成果及其对当代哲学改造的决定性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自2014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批准号:14ZDB018)获准立项以来,研究组成员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一方面全面深入研究和吸收西方生命科学与生命哲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发扬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优秀成果,试图创建一个符合新时代的生命哲学。

在欧洲生命哲学研究中,有过多次试图吸纳东方和中国传统生命概念的尝试,例如,在叔本华和尼采生命思想中,有对禅宗生命思想的向往;在

“后现代”思想家中也出现倾向于东方思想的趋势,但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生命思想的认识及其实际经验的缺乏,远远大于中国思想家对西方生命思想的认识程度,使他们的各种相关努力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而且,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欧洲哲学家也往往满足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框架,始终处理不好科学发展中“科学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他们没有认真从中国科学发展史、中国医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丰富经验中总结出对于生命的自然淳朴概念,阻碍了新型生命哲学的创建。

因此,实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生命哲学研究的突破口,恰恰就在于克服欧洲生命哲学的功利性和工具性,深入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体中心主义,彻底摆脱福柯所说的“正常与异常的割裂”的西方传统思想模式^①,针对欧洲生命概念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与“非生命”、“科学”与“哲学”、“主体”与“客体”的割裂和对立,以中国传统生命观中“有形与无形”和“阴与阳”的辩证法,从“天、地、人”相互紧密结合的广阔视野,积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将中国漫长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潜在创造力量,特别是中国生命哲学和医学中的自然的淳朴性质加以发扬光大,坚持在生命自身的生活过程中,把生命的哲学意义同自然科学意义结合起来,避免欧洲生命哲学一再重复的“身心两分法”或“科学和哲学的学科逻辑区分原则”,朝着开创新生命哲学的方向,进行尽可能全面而灵活的新型哲学探索。

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是《易经》,接着是老子和孔子等人,在社会和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刻,准确地把握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而他们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始终以“生命”作为哲学研究的焦点,创建天人合一的独具特色的生命哲学。这种建立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中国哲学,从先秦的原初形式,经历两汉至魏晋时代而与外来的佛教哲学相结合之后,进一步丰富了生命哲学的内涵,特别是提升了生命存在的工夫理论风格,使此后的中国生命哲学具有生命本体论与生命存在工夫论相互渗透的特点。

^① Foucault, M. *Folie et Dér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Plon, 1961: 5-20.

所以,开拓生命哲学创新的空间,存在于两大方向的研究和努力。首先,通过此项研究,以客观的态度,克服迄今为止欧洲生命哲学各个学派所走过的“各持己见”的偏向,通过认真的生命哲学史的科学梳理,全面总结和吸收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各国生命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根据各个学派之间的历史和当代争论,归纳出各个学派生命理论中的特点,特别是揭示其弱点,作为我们继续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其次,结合当代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在发扬中国生命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纳入源自中国传统的科学风格和生命智慧,开拓出我们自己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生命哲学的广阔发展空间,为中国现代化所急需的民生建设和全球生命共同体的幸福生活前景,提供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型生命哲学的中国创新版。这一切,不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生命哲学研究的短处及其症结,就在于忽视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又把“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得很清楚,同时也很少关注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致使中国哲学中的生命哲学,基本上只研究“儒释道”三大家的传统理论观点,而国内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的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又不熟悉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甚至直接为我们创建中国版的新型生命哲学提供新的科学基础。最鲜明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所创建的“细胞全息理论”,其对创建我们自己的新型生命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细胞全息理论”,生物体从细胞到整体之间普遍存在中间结构层次及其内在联系,由此提出了生物体结构的全息胚学说,创立了全息生物学,使人们对生物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和观念性的改变。我国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汪德耀教授指出:细胞全息理论的提出同细胞的发现以及细胞学说的提出有着相同的重要科学意义。“如果说伟大的达尔文进化论打破了物种的种与种之间的绝对界限,形成生物系统的进化论,那么,全息胚学说就打破了生物个体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绝对界限,是生物个体的新型进化论”。张颖清教授以及我国其他生命科学、纳米技术、控制论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尚未提升到哲学理论的层面,有待中国新型生命哲学进行总结。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 21 世纪,生命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目标,也直接关系到人的社会命运,还关系到全球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未来幸福生活。

具体地说,生命哲学研究具有四方面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首先,生命哲学的新成果将全面重建 21 世纪的哲学,使之成为以新的生命观为核心、紧密结合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丰富经验、结合中西思想文化传统和当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新哲学,而这种新哲学的创造动力正是来自它对生命的极度关怀。当然,在创建以生命哲学为核心的 21 世纪新哲学的时候,不能忘记,恰恰是中国哲学始终坚持对于生命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生命论题始终是研究的焦点,生命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内核,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伦理观、社会观、文化观和运筹观的基石,集中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历史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身的持久珍爱情怀以及对生命认真负责的至诚品德,集中体现了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尊道贵德”的生命价值观的哲学意义,运载着持久推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不断更新的生命活力。

探讨新时代生命观,我们首先必须珍视集中总结了中华民族生活智慧的优秀国学宝典,尤以《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孙子兵法》为典范,一方面从“天地人三才”和“易与天地准”的纵深广阔视野,坚持“天人合一”和“心物一元”的中国传统生命观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探索和发扬国学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伦理观、运筹观的内在核心价值及其相互关联,突出宇宙自然化生万物之大德,置“尊道贵德”于首位,贯彻“善生”的为人之道;另一方面,集中环绕人的“万物之灵”性能,深入探索人类生命“心身合一”的精微复杂特征,揭示人为“万物之灵”的真正意义,针对新时代生态危机对于生命的威胁,结合最新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以创新精神,重新评估《黄帝内经》等医学宝典对于生命的“易且深”的珍贵总结,发扬《黄帝内经》关于“精气神为生命之本”、“阴阳为万物纲纪”的基本原则,维护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越来越多的人,灵活巧妙

地发扬“医病医国同道”的伟大精神,把个人修身养性、行善施仁和治病健身营卫的实践,相互结合起来,遵循共同理性的原则,以新时代精神,积极运筹人生,合理调控心身关系,以科学的营卫养生,维护和发展生命,使个人生命、社会生命、国家生命、自然生命、世界生命及宇宙生命等不同的命运共同体,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其次,生命哲学的研究将有力地促进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转化,使哲学与科学技术环绕生命的论题,实现和谐发展和同步更新,保障哲学和科学技术在新世纪的全面复兴。

再次,对于生命的哲学研究的推进,势必联系到对人本身的整体研究,将同时地改变 21 世纪的人文思想,使之成为以关注生命为中心的新人文思想,不仅创建新的人的概念,而且也全面地改变人与“非人”(包括动植物、周在世界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把哲学、科学、艺术、生态研究结合起来,为创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和谐幸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思想基础。

最后,为推进现代化的民生建设提供符合时代精神的生命哲学理论,保障 21 世纪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为努力开创全球和整个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生态环境,做出必要的贡献。

未来新世纪的科学更新,无疑将以新生命科学为中心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说,21 世纪正在明显地成为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性质本身极其复杂,从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来看,它是一切科学研究对象中最复杂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显然源自生命自身的高度变动性、创造性、变化可能性,它是世界上一切现象中最复杂的现象,它本身原本就是世界和宇宙发展的最高产物,科学史和世界发展进程的历史,人类知识的发展史以及哲学研究史,都证明生命现象的高度复杂性及其难以攻克解决的大难度。但同时,从中西方哲学史和人类科学研究中,生命研究是最有挑战性的,因为它在向人类智力提出高难度问题的同时,又向研究者发出富有启发性的暗示,因为生命的活生生性质及其自我创造性特质,从研究者本身的角度,产生出进行自我挑战和自我提示的复杂反应,促使具有生命创造力的科学研究者和生命哲学研究者,不断地向生命难题挑战,并一再尝试使自身进入生命研究的漩涡中,试图在来回研究和发出难题之间,进行无止境的研究游

戏,促使研究者在向作为对象的难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同时向研究主体自身焕发出研究智慧,给予研究者进入难题研究的兴趣和乐趣,让生命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互动,在互动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方面,双双获得相互认识和相互挑战的激情。

生命研究的进程,特别是近来在对各种病毒研究中出现的既奇特、又富有引诱力的现象,就是研究者越发现被研究的病毒的更多奥秘,就越获得对付作为对象的病毒的新奇科学手段;更加神奇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病毒,面对新的科学成果,就越以更灵活的方式,更新其生存形态,甚至产生新的更复杂和更高一级的免疫力,以提升病毒本身具备攻击外在生命的能力,促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克服的互动状态,一再地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样也促进对于生命的研究的更深入发展。

所以,生命哲学研究和生命科学研究一样,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生命奥秘的更多难题;另一方面又一再地产生和开辟揭示生命奥秘的新动力和新智慧,让生命科学研究和生命哲学研究,在面临难题与解决难题的互动游戏中,一步一步地深入生命的迷宫中,并从中同时地享尽生命运动以及生命研究活动的乐趣,积极地推动人类社会文化在 21 世纪的全面复兴。

从根本上说,创新就是生命本身的内在需要。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创造的活动性存在;也就是说,只要生命存在于世,它就永远处于变化革新中。生命的运动性和创造性,表明生命本身的缺乏性。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论证了生命通过自我消耗不断寻求自我更新的“负熵”运动性质。既然生命永远寻求创新,永远使自己处于缺乏状态,所以,生命总是要在缺乏中实现无止境的超越,试图一再地填补自身的欠缺;但它又永远无法完全克服自身的缺乏状态。这样一来,“缺乏”反而成为生命存在的基本状态,同时又成为生命实现自我创造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这样一来,以新型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创建的 21 世纪新人文精神,将充分展现人类的创造力量以及人类力图不断提升自身生存能力的基本特征,它集中了人类自然本性及其文化创造的积极能量和无限潜力,同时也体现了未来人类文化创造的基本模式,旨在不断地丰富人性本身的内容及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21 世纪人文艺术精神是人类生命本身不断更

新和不断重建的思想精神力量,它充分体现在生命自身的持续自我重建和不断自我创造过程,它的持续性及其在 21 世纪的自我展现,标志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转折。

不同于传统的人文思想,21 世纪的新人文艺术精神把人文与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文的艺术化”和“艺术的人文化”同时进行,致使当代人类一切创造活动都显示出人文与艺术的高度结合,它集中体现当代“科技人文”、“生态人文”、“数字人文”的基本特点,也集中体现 21 世纪新型人文思想的“人文—艺术—科技—生态”的“四合一”基本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艺术是贯穿整体结构的基本力量。

未来新世纪的科学创新,无疑将是以新生命科学为中心而展开,21 世纪正在明显地成为生命科学独占鳌头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新时代,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命的创造精神而自豪。为了不辜负生命本身和全球现代化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创新,展现出生命无限超越的潜在性、可能性及其现实性,永葆生命的青春活力!

2018 年秋末于上海交通大学

前言

孤独中的随性任情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个通常被界定为法国思想家的日内瓦人,在文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和哲学诸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在其庞杂的研究主题中,文学和哲学作品使其生前在欧洲文坛声名鹊起,政治学论著则使其身后影响力跨越时代和洲际,甚至超过了伏尔泰、狄德罗等那些在他的时代声望高过他的启蒙领袖。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中国近代革命的需要,卢梭最初传入中国正是缘于其政治思想,其中,使他得以名扬四海的“契约精神”和让人争执不休的“公意”概念,是卢梭被引入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心所在。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卢梭与义正词严的政治判断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被拉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以后,卢梭在国内学界眼中依然带着一副严肃的面孔。然而,无论是童年时期和父亲一起通宵达旦阅读的卢梭,还是青年时期热吻着与华伦夫人初次见面之地的卢梭,再或是用老年的喉咙吟唱家乡曲调,又在颠沛中逃难的卢梭,他始终是那么柔情满怀,热衷于自然风光,随性任情,甚至无论在著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缺乏审慎严谨的态度。

卢梭在作品撰写中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为己任,即使在作品遭到焚毁,被迫四处逃亡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中依然对自己的一些作品充满肯定,而且预言了作品在后世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作品,他都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与非凡之处,而且也拿出巨大的勇气来保护这种独特与非凡,即便为外界所不容。但步入文坛之前的卢梭并未有如此雄心抱负,他只是——一个为了躲避残暴的师傅逃跑的学徒,一个为了衣食改宗的流浪儿,借着一些机缘,幸遇华伦夫人,才得以安定并有了学习的机会。快要步入而立之年

的卢梭,怀揣着音乐梦想,只身来到巴黎闯荡,希冀在音乐创作上能有一番作为,而后衣锦还乡,挽救华伦夫人遭遇的经济危机,与华伦夫人再续幸福生活。但却因回应第戎科学和文学院的征文启事“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Si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a contribué à épurer les mœurs?),创作了一篇哲学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文化界一举成名。这篇论文把卢梭带入写作领域,促使他开始了书写的生涯。此后,他的名气日盛一日。小说《新爱洛伊丝》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教育学著作《爱弥儿》和政治学著作《社会契约论》一经出版就因挑战了当时的政府和宗教权威,被下令焚烧,卢梭也因此遭遇被批捕和四处逃亡的命运。这样的轰动虽为卢梭带来了劫难,但同时也反映出卢梭思想震慑了当局和教会,体现出其思想的巨大革新力。尽管卢梭自己把并不把这一劫难归因为这两部作品思想的“危险性”,而是归结为一些团体对他个人的迫害。

带有戏剧性的是,在18世纪的法国,被捕入狱对文人而言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毋宁是给自己的身份打上一种革新的标签。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都被关过监牢。文人被政府视为敌人,正说明了他本人不囿于过去的传统和认知,具有独到新颖的见解,这几乎成了文人圈时髦的象征。所以,被当局防范不会削弱文人在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然而,卢梭不仅与当局不和,也和同代的文人产生了诸多隔阂嫌怨。之所以成为政府、宗教和哲学家群体共同的敌人,除了由于卢梭独特、直率的秉性气质难以应付社交圈的复杂以外,还因为他的思想不仅和正统思想不一致,也和同代革新派的文人见解不一。所以说,卢梭虽然和同代的文人一起加入了启蒙,反叛传统的思想和制度,但是,卢梭的反叛却又和同代人方向不完全一致,卢梭不仅超越了过去,也超出了他的时代,成为现代性的先驱。

一位研究卢梭的比利时青年学者希望研究中国文化,选择了鲁迅,认为鲁迅同卢梭一样都是充满了愤怒和憎恨情绪的人。如果从批判时事的角度看,卢梭和鲁迅的文本都有针砭时弊的意义,而且都在鞭笞时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者有相似之处,而且这种对时事的不满和满腔的愤懑,为作者带来了孤独感。但是,不同于鲁迅把寂寞视为缠住灵魂的大毒蛇,卢梭珍视孤独的状态,而且像个隐者一样,主动选择孤独。在卢梭隐居于“退隐

卢”期间,和狄德罗决裂之前,他们就曾因为对待孤独的态度产生过矛盾和书信辩论。狄德罗在他的作品《私生子》中出现过“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的言论,而卢梭则认为一个自愿过孤独生活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他人。卢梭的作品中关于孤独和独居的文字俯拾即是。

卢梭在《忏悔录》中对自己性情的许多解说,实际上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别人对他的攻击。其中,针对攻击他避世的言论,卢梭在《忏悔录》中有一段关于青少年学徒时期孤僻性格形成的解释:“由于我喜欢这种空中楼阁,又容易到那里去神游,结果,我就讨厌起我周围的一切,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从此以后,我始终是一个爱好孤独的人。乍看起来,这种性格显然是极端恨世的,十分阴郁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从一颗充满热情、善良、温和亲切的心产生出来的,而这颗心,由于找不到跟它相似的心,就不得不耽于幻想了。”^①

到了巴黎,当卢梭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显贵的座上宾后,巴黎的社交风不仅没有驱散卢梭的孤独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对孤独的向往,抑或是对社交的逃避。卢梭因为《论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这件事却促使他下决心过自由而清贫的生活,面对络绎不绝的拜访者,卢梭坚定地谢绝见客。初入巴黎,卢梭为了谋求在音乐上能有出路,不得不设法进入上流社会的圈子,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名气已可以赢来更多抄写乐谱的主顾后,首先放弃了在巴黎名媛杜邦夫人家的职务,接着一改衣着打扮,从社交流行风转到朴实无华的着装。对于巴黎社交派头,卢梭言语中透露出这样的态度:“我的羞涩出于害怕失礼,我就决心去践踏礼俗,使我的胆子壮起来。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②

越是深入巴黎社交圈,卢梭越是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

①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47 页。

② 卢梭:《忏悔录》(第二部),范希衡译,徐继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454—455 页。

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之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①在自由独立中，摆脱与文人和贵妇的纠缠、人际关系的纷扰，甚至是造谣滋事，这样既远离是非，又免除了保护人对命运的支配。

从孤独中赢得自由，因自由而寻求孤独，孤独和自由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卢梭独树一帜的思想，但又使他与社交场合格格不入。尽管卢梭竭力避免社交生活，然而，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初期的成功还是让他免不了结交一些文人才士，得到一些显贵的青睐。除了杜邦夫人外，卢梭还与德比奈夫人一度关系密切，这两位都是活跃在法国文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同时，又有着显赫的家庭。遗憾的是，早期结识的朋友后来几乎都成了卢梭的敌人。所以，卢梭在晚年的时候，虽然依然受到显贵的保护，如卢森堡元帅和卢森堡夫人，但孤独如影随形，因为他不仅得罪了政府和教会，也树立了许多文敌，又与曾经的保护人产生嫌怨，而且遭遇又加剧了他的迫害幻想，在《忏悔录》中对保护他的卢森堡夫人也流露出一丝质疑。这让卢梭更多地舔舐孤独，在临终前两年撰写了一部题为“孤独漫步者遐想”的自传性文集。

孤独，不仅不像狄德罗所言是恶的，在卢梭眼中反而是美德的保障。虽然结交文人显贵加上作品的成功，使他从一个流浪者晋升为上流社会的名人，在巴黎得以生存下去，有了立足之地，但是，卢梭不仅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没有褒扬之词，而且对文人圈子也并无好感，甚至透露出憎恶之情。

文人的钩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憎、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

^① 卢梭：《忏悔录》（第二部），范希衡译，徐继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607 页。